

战略与管理

2016
②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智慧城市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 主编



中国计划出版社

中国与全球治理：跨越门槛的四种路径

吴逢时

多边主义一直以来都不是中国处理外交事务时所青睐的方式。与诸如印度、德国、日本和巴西等“次级大国”相比，中国在国际机构中的参与度（财政与人员方面）与影响力是最不引人注目的，或者说最不与国力相匹配。^[1]然而，这一特点在习近平担任国家领导人两年内发生了变化，中国推动了几个超大级别的跨洲的多边合作和制度建设的项目，例如新开发银行^[2]、丝路基金、亚太自贸区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提升中国在多边和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地位，其实是从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向习近平“奋发有为”和“伟大复兴”战略的整体转变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此背景下，关于中国崛起和世界秩序的论争日益升温。^[3]中国是

[1] Hongying Wang and Erik French, "Middle Range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 *Third World Quarterly* 34:6 (2013), pp. 985-99.

[2] 前身为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倡议建立的金砖银行。

[3] 中国崛起是否会挑战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和中国专家主要研究课题之一。例如：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87: 1 (2008), pp. 23-37; Gregory Chin and Ramesh Thakur, "Will China Change the Rules of Global Order?" *Washington Quarterly* 33: 4 (2010), pp. 119-38; Yaqing Q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Process: Institutions, Identities 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Chinese Journal of*

将融入、改革、挑战抑或反抗全球治理中现有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无疑是对国际关系有很大影响的问题，而目前论争中缺失的，是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系统探讨。^[1]中国是不是不同领域全球事务中主导力量的一部分？中国在所参与的全球机构中主要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中国是如何应对现行全球治理原则和规范的，如何履约的？这些“是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没有答案，“中国即将改变国际秩序”无从谈起。本文并不意在跃进式地断言（或谴责）中国会给国际事务制定新规则^[2]和改变全球治理面貌，而是切实探究在不同领域的全球治理中国参与的情况，以及这些现存的情况将如何影响中国在未来几年中提升存在感及跨越实质性的“门槛”，是否可能从全球治理体制中的普通一员转变为核心成员。

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既存的研究有三个方面的推进。首先，本文归纳出一个简约而能说明问题的“国家与全球机构之间关系”的分类框架，这一框架可以被广泛地运用，特别是用于研究上升期间的“次级大国”。其次，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 2 (2010), pp. 129-153;; G. John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90: 3 (2011): pp. 56-68; Mingjiang Li, "Rising from Within: China's Search for a Multilateral World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ino-US Rel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17: 3 (Jul-Sep 2011), pp. 331-51; Shaun Breslin, "China and the Global Order: Signaling Threat or Friendship?" *International Affairs* 89: 3 (2013), pp. 615-34; Georg Sørensen, *A Liberal World Order in Crisis: Choosing between Imposition and Restrain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 [1] 该领域并不缺乏回顾中国参与各种全球机构历史演变的研究，然而，跨多领域比较实证分析的成果不多：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D.C.: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distributed b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Gerald Chan, *China's Compliance in Global Affairs: Trade, Arms Contro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uman Rights* (Hackensack, N.J.;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Pub., 2006); Ann Kent, *Beyond Compliance: Chin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Global Secur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Alastair I.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Edward S.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Economic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Mingjiang Li, ed. *China Joins Global Governance: Cooperation and Contentions*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2).
- [2] Philip Stephens, "Now China Starts to Make the Rules," *Financial Times/Comment* (28 May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ft.com/intl/cms/s/0/9dafcb30-0395-11e5-a70f-00144feabdc0.html#axzz3dTvAq10A>, accessed 28 May 2015].

本文使用这个框架系统地分析和梳理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情况，涵盖经济发展、安全、人权、环保和能源等领域，从而勾勒出一幅复杂的、参差不齐的图景。第三，本文概括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提升自身地位 4 条主要途径，并且提出在国际体系结构性的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之外，中国与各种全球机构和制度之间既存的不同关系直接影响、制约或激励中国今后针对性的行为。只有在中国与国际准则和制度对接顺利的领域，中国才会大胆地、直接地寻求领导性的角色。而且，即便在这些情况下，中国也不会背离现有的全球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和规范，也不会以全新的系统取而代之。事实上，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政府会更加关心在一部分全球性治理体制中尚未掌握足够的话语权，甚至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会大量投入，从而积极改善目前被动的局面。

除了前言与总结，本文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回顾现有文献（主要是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情况的总体阐释和具体的不同案例），引入并解释了一个“国家与全球机构之间关系”的分类框架。第二部分运用框架分析中国在不同的全球管理体制中的参与表现，涵盖经济发展、安全、人权、环保和能源等领域。最后，文章阐释了中国在多边外交中最近的一些发展情况，提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曲折前进的 4 条不同路径。

一、文献回顾：国家与政府间组织的关系

在回顾有关中国和全球治理的文献之前，先澄清一下本文使用的“全球治理”概念的定义和范畴。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的空间扩张，涉及越来越多的政策领域，诸如环保、扶贫、公共健康和人类安全（非传统安全）。与传统的国家间区域性组织或特定的地缘政治多边组织不同，全球治理性的机构普遍旨在通过制定规则以管理全球性的公共事务，获得全球性的“公

共产品”。^[1] 本文虽然认同全球治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和非政府组织（NGO）日益突出的重要性^[2]，但主要关注的是全球治理中以主权国家间达成协议为基础、建立政府间国际组织（IGO）和条款为中心的层面，因为中国参与的全球治理主要集中在这一层面。^[3]

跟本研究有关的政治学文献主要有两大类。^[4] 第一类是中国和一组相似国家的对比研究。^[5] 这些研究既指出在与全球机构的互动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所持的相似主张和兴趣点，也发现了在参与程度和贡献上，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次级大国”的显著区别，提醒我们中国在全球机构中目前的表现还十分有限。

第二组文献以中国为中心，分析中国与具体的全球或多边机构之间的

[1] Peter Haas, Robert Keohane and Marc Levy, eds., *Institutions for the Earth: Sources of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lobal Environmental Accords Serie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3); Lawrence S. Finkelstein, "What Is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1 (1995), pp. 367-72; Navroz K. Dubash and Ann Florini, "Mapping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Global Policy* 2 (Sep 2011), pp. 6-18.

[2] James N.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Ann M. Florini, *The Third Force: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0); Peter Willett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World Politics: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Deborah D. Avant, Martha Finnemore, and Susan K. Sell, *Who Governs the Glob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 在不久之前，中国在国际混合型组织（国家与非国家组织都能成为成员）和非政府组织（NGO）中的参与程度还是有限的。见 Gerald Cha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ince 197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1989).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中国国内非政府组织基本无法参加国际政府间会议。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和国属研究机构在国际混合组织中越来越引人注目和活跃，这些组织包括国际大坝委员会、国际水电协会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但目前尚处于不发达的阶段。

[4]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on C. Pevehouse, "Democra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0: 1 (2006), pp. 137-67; Jon C. Pevehouse and Edward D. Mansfield,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Variet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2: 2 (2008), pp. 269-94; Paul Poast and Johannes Urpelainen, "Fit and Feasible: Why Democratizing States Form, Not Jo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7: 4 (Dec 2013), pp. 831-41.

[5] Ann Florini, "Rising Asian Powers and Changing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3:1 (2011), pp. 24-33; Miles Kahler, "Rising Powers and Global Governance: Negotiating Change in a Resilient Status Quo," *International Affairs* 89:3 (2013), pp. 711-29; Wang and French (2013).

关系和这一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例如, Sohn 发现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管制体制, 对不同规则的吸纳和遵守不同, 部分原因是这个领域内治理结构的松散, 不同规则的监管程度不同。^[1]Foot 认为未来几年中国在联合国各机构中影响的提升将与一些悬而未决的国际事务的处理和特别的外交历史息息相关。^[2]Kastner, Pearson 和 Rector 通过对 6 个案例的比较分析得出中国是否会全力参与多边机制的建设和决策受制于两个主要因素: 中国游离于多边机制外的可能性和成本, 以及其他成员国对于中国参与的态度。^[3]虽然这些研究尚未建立一个可以综合解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时的理论, 但已经非常清楚地发现了中国与全球机构关系的复杂性, 并尝试找到相关因果关系。这些建立在历史材料和系统比较分析的研究发现非常重要, 基本否定了“中国推翻国际秩序”的妄论。选取一些中国参与国际治理最成功、最大胆的行为, 断言中国正在获取对全球事务的领导权, 是忽略了大量经验材料和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程度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参差不齐的, 而且还有不少领域, 中国还处在治理框架之外, 恰恰是被治理、监督和约束的对象。中国多边外交的未来受着特定国际机构的特点和中国在这些机构中过去的参与历史的约束和影响, 有所发展和突破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如何在全球治理中转换角色, 本研究引入了一个简明的系统的分析, 首先将国家与不同全球机构之间关系进行系统分类 (见表格 1), 然后梳理中国的情况 (见表格 2)。本研究并不是直接找到政

[1] Injoo Sohn, “Between Confrontation and Assimilation: China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 82 (Jul 1 2013), pp. 630-48.

[2] Rosemary Foot, “‘Doing Some Things’ in the Xi Jinping Era: The United Nations as China’s Venue of Choi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90: 5 (Sep 2014), pp. 1085-100.

[3] Scott Kastner, Margaret Pearson and Chad Rector, “A Rationalist Approach to China’s Behaviour in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13 Annual Meeting (manuscript provided by the authors).

治现象背后因果关系及相关变量的简单概述，而是初步梳理出主要的政治结果和区分可能存在的几组相关关系。

表 1：不同国家在全球机构中参与情况的类型理论

成员国状态	参与特征	
成员	履约者	摇摆不定者
非成员	旁观者	被排斥者

对于不同国家参与全球机构进行分类，最直接、不可回避的第一步就是看是否取得成员国的地位。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国家、什么类型的治理体制，正式成员国的身份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一国直接参与多边管治的入场券。与其他文章不同，本文非常重视“非成员国”的情况，并且认为对于研究上升期间的地区强国、新兴大国，这一大类情况不容忽视，“非成员国”身份并不等同于毫无作为、不可作为。中国作为二战后参与全球治理的后来者，在大量全球性的组织中并非缔约国或者核心成员国，甚至仍在努力申请成为各种政府间组织的成员国。事实上，下文将会显示，因为习近平政府决心提高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在一些领域中尽管中国并非该领域全球治理核心机构的成员国，它的行为也引起了现有成员国之间激烈争议。

在一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政府间组织正式成员后，根据其履约程度分成两类：如果该国明确履行国际承诺，不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那么本文将这样的成员国称为“履约者”；^[1] 否则，假如该成员国对某国际组织的承诺仅仅停留在签约层面，没有切实的履约行为，甚至“口是心非”，继续被发现背离国际约定的精神和具体规定的行为，就被认为是“摇摆不定者”。一个“摇摆不定”的成员国，经常遭受到来自国际组织和其他成员国（特别是核心成员国）的舆论监督和评议，甚至条约允许范围内的处置（并非一定有效）。然而，“履约者”是一个理想概念，事实中也

[1] 如果某国与特定的国际管理机构没有直接的联系或者不受其制约，但有时也会根据国际机构的原则来调整本国施政行为与政策，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履约”。

有一定程度的不同,但是,根据国际组织的会议记录和集体决定等材料综合判断,“履约者”和“摇摆不定者”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履约者—摇摆不定者”的二分法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区分,意在找出国际组织中不同国家参与状态的区别。^[1]与财政投入和人员贡献等其他更加技术化、量化的指标相比^[2],这种相对比较是一种更宏观、更政治性的描述和分析。

对于仍然置身于某国际管理机构之外的国家,根据该国是“主动”还是“被动”被排除在外,也分成两类:如果某国根据自身情况,反对其他国家发起成立的国际管治制度,主动置身于某国际组织之外,那么被称为该组织的“旁观者”;如果一国递交的申请被国际组织驳回,那么则被称为“被排斥者”。

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本节首先简单回顾中国进入国际组织和治理的历史,然后运用表格 1 的类型划分来分析和比较在 5 大领域内中国参与的程度,这 5 大领域分别是经济、安全、人权、环境保护和能源。不论是在跨领域的层面还是在某领域之内,中国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关系和参与状态都呈现明显的差异性。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历史始于 1971 年在联合国成员大会恢复合法席位。之后,除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短暂低潮,中国在多边、全球治理机构中的参与程度日益扩大和加深。^[3]以 2001 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受到了联合国下属和广泛性国际组织的欢迎。^[4]尽管如此,在中国积极参与和主办国际会议并签署国际协议的欣欣

[1] Sara M. Mitchell and Paul R. Hense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Compliance with Agree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 4 (Oct 2007), pp. 721-37.

[2] Wang and French (2013).

[3] Economy and Oksenberg (1999); Chan (2006); Johnston (2008).

[4] David L.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New York: Oxford

向荣的景象背后，也有大量的排斥、犹疑不决，甚至抗拒的案例。在胡锦涛任总书记末期，中国在全球治理的参与进度仍然可称为“融入过程中”。^[1]

一方面，作为二战后国际体系的滞后参与者，因为大量未解决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联合国到亚洲地区组织，再到 WTO 和 20 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G20），成员资格认可、适应到逐渐融入，步步为营，并不像冷战后中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加入欧盟、北约、申根条约那样一气呵成。^[2]另一方面，因为中国自身的文化与内政，对待全球治理的态度是谨慎的，甚至是“矛盾而且不信任的”。^[3]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 130 多个多边组织的成员国和 300 个多边协定的签约国，^[4] 但是由中国发起组建的国际组织寥寥无几，其中包括像国际竹藤组织这样事务性功能较强的机构。^[5]

在不同领域的国际治理中，中国的表现和参与程度虽然呈现了相似的深化趋势，然而与此同时，也呈现了不均衡的情况。中国对全球市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融入是最明显的，但是在人权领域，中国是颇受异议和批评的联合国人权条约签署国之一。在军备限制和安全领域，中国的表现有相当大的不均衡性，受具体的条约内容和治理构架影响很大。在环保和能源等政治性相对弱而功能性相对强的政策领域，中国与相关国际组织之间关系的不均衡更加明显。出乎意料的是，在最重要的国际能源机构中，中国几乎都被排斥在外。表格 2 列举了中国与 5 大领域中 18 个最具代表性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21-55.

[1] Shambough (2013), pp. 153-55. 尽管 Shambough 对“中国对多边主义持高度谨慎态度”的判断一语中的，但是他对此归因于中国在春秋时期（公元前 800- 公元前 400 年）的政治文化，有些令人失望。这样基于文化的阐释不一定是错误的，但是却忽略了并不久远的冷战历史，以及中国在上世纪 60 年代主动将自身疏离于全球霸权势力所产生的影响。

[2] Economy and Oksenberg, 1999, pp. 1-41.

[3] Shambough (2013), p. 155.

[4] Shambough (2013), p. 136.

[5] 此处有人会认为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首次尝试组建并领导一个国际机构，但是上合组织通常被视为一个区域性地缘政治组织，尽管在本文中它被认为是具有潜力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的组织。

表格 2：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情况

领域		国际组织 / 条约	中国的参与情况	
			成员状态	参与特征
经济	贸易	世界贸易组织	正式成员	履约者
	金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正式成员	履约者
	发展	世界银行	正式成员	履约者
安全	军备控制	核不扩散条约	正式成员	履约者 / 摇摆不定者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正式成员	履约者 *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非正式成员	被排斥者
		渥太华禁止地雷公约	非正式成员	旁观者
	反恐	防扩散安全倡议	非正式成员	旁观者
人权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正式成员	摇摆不定者
		国际刑事法庭	非正式成员	旁观者
环境	野生动植物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正式成员	履约者
	大气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正式成员	履约者
	水资源	联合国水公约	非正式成员	旁观者
能源	矿石能源	石油输出国组织	非正式成员	被排斥者
		天然气输出国论坛	非正式成员	被排斥者
		国际能源署	非正式成员	被排斥者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非正式成员	被排斥者
		核能机构	非正式成员	被排斥者

注：* 中国尚未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的国际治理机制的关系和参与特征。

在经济领域，研究者们基本的共识是中国政府的学习能力和愿望都比较强，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制的过程相对顺利。^[1]WTO 成员国的地位给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根本性的催化，中国市场日益适应和趋向全球标准。^[2]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金融机构也希望中国发挥更多的作

[1] For example, Timothy Webster, “Paper Compliance: How China Implements WTO Decisions”,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5: 3 (2014), pp. 525-78.

[2] Margaret Pearson, “The Business of Governing Business in China - Institutions and Norms of the Emerging Regulatory State”, *World Politics* 57:2 (2005), pp. 296-322; Jikun Huang et al., “Agricultural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Poverty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用，中国委派的技术官僚和专家开始进入到这些机构的高管层面。^[1]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扶贫模式也引起了更广泛关注，推动了国际社会反思，更愿意听取中国的意见，愿意将其纳入改革国际发展援助治理方式的讨论范围。^[2]

在军备安全方面，中国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在联合国裁军对话中“效仿”其他国家^[3]，90年代“主动学习”并且有效履行部分军控条约^[4]，发展为21世纪00年代后期在维护和平、冲突后管理和国际军事合作中承担更多责任。^[5]尽管如此，中国在该领域的参与是高度混合的，而且没有完全融入冷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武器控制体制。一方面，中国对诸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渥太华地雷禁止条约》明确持保留态度，并且对美国在9.11恐怖袭击后号召的“全面反恐战争”半信半疑。^[6]另一方面，美国、其他核大国及国际舆论对中国履行《核不扩散条约》褒贬不一，加上全球裁军和武器贸易方面的机构没有完全接受中国的申请，对中国在相

Review 18:3 (2007), pp. 244-65; Claustre Bajona and Tianshu Chu, “Reforming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Effects of WTO Accession,”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3: 4 (2010), pp. 800-23; Jun Yang et al., “The Impact of the Doha Trade Proposals on Farmers’ Incom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33:3 (2011), pp. 439-52.

[1] 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曾于2008-2012年担任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前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也自2011年起担任IMF副总裁职务。

[2] Sophie Harman and David William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90: 4 (Jul 2014), pp. 925-41; Jing Gu, Xiaoyun Li, Gerald Bloom and Xiulan Zhang, “Introductio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Bulletin* 45: 4 (2014), pp. 1-5.

[3] Johnston (2008), pp. 45-73.

[4] Evan S. Medeiros, *Reluctant Restrain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onprolifer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1980-2004*,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 Qingguo Jia,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Hokkaido University Slavic Eurasian Studies*, 16: 2 (2007), pp. 113-123; Bates Gill and Chin-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Peacekeeping: 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SIPRI Policy Paper*, 25 (2009) [available at: http://books.sipri.org/product_info?c_product_id=393, accessed 20 May 2015]; Chin-hao Huang, “Principles and Praxis of China’s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18:3 (2011), pp. 257-70; Kastner et al (2013).

[6] 9.11恐袭以后，小布什政府力推《防扩散安全倡议》，中国持保守、或近于反对态度，并没有加入。

关领域的国内执法和国际履约尚存疑虑，多有批评。^[1] 例如，《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没有接纳中国在 2004 年提交的成员申请，尽管中国自此承诺不帮助任何国家发展可被用于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技术并且自愿实行接近 MTCR 的控制列表。^[2] 反过来，中国为加入 MTCR 创造了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可以加入《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从而中国与这两个全球制度之间出现了双重僵局（double deadlock）。^[3] 总之，对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参与表现用一种类型来概括常常是不行的，要用到 4 种国家—政府间组织关系类型中的两种或者更多来定义。

同经济和安全领域相比，中国在人权领域的融入更加不被看好。然而，即便在该领域，中国不再是完全被排挤在外，而是“全面渗入”联合国主导的措施、实践和机制网络中。^[4] 最近一项对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由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改革和升级而来）表现的研究显示，自 2006 年起，中国主要“采取一种自我保护性的策略，以避免主要来自美国的尖锐批评”，并且“在联合国的人权机构中非常注意避免强加自己的国际影响”。^[5] 对非联合国主导或者联合国框架之外的国际人权机制，中国则采取了积极防御的姿态。尽管中国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1] Ian J. Stewart, “China and Non-Proliferation: Progress at Last?” *The Diplomat* (25 March 2015) [available at: <http://thediplomat.com/2015/03/china-and-non-proliferation/>, accessed 20 May 2015]; Ian J. Stewart and Daniel B. Salisbury, “Wanted: Karl Lee”, *The Diplomat* (22 May 2014) [available at: <http://thediplomat.com/2014/05/wanted-karl-lee/>, accessed 20 May 2015].

[2] Victor Zaborisky, “Does China Belong in the 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 *Arms Control Today* (2004) [available at: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04_10/Zaborisky, accessed 20 March 2015]; Neils A. Rasmussen, “Chinese 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 Regime or No Regime?”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Brief* (February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diis.dk>, accessed 20 March 2015].

[3] Saferworld's China Program, “Expanding and Sustaining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Saferworld* (London: Saferworld, January 2015).

[4] Rosemary Foot, *Rights Beyond Borders: The Global Community and the Struggle Over Human Rights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5] Sonya Sceats (with Shaun Bresli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ystem* (London: Chatham House, October 2012), p. 2.

公约》，但中国坚定反对国际刑事法庭的成立及其所倡导的原则和治理方式。^[1]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环境保护成为中国参与国际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的新领域，至今已经签署了大部分的国际多边环保条约，并且国内的环境治理也保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长期以来欢迎相关国际专家、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开展合作。^[2] 中国在 1981 年 1 月加入了《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CITES），并在全国各级政府建立 CITES 办公室，特别是关键省市。全国性的 CITES 执行协调小组也于 2011 年成立，来加强协调所有相关政府机构的政策实施，并得到联合国 CITES 秘书处的嘉奖。然而，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过程就不像 CITES 一样顺利。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中国就积极加入各种国际气候相关谈判，并且在 1992 年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 年加入《京都议定书》。到了 21 世纪 00 年代中期，中国转变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家，但是没有在国际场合承诺碳减排的具体目标，从而备受指责。然而，中国国内在利用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步，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减少工业污染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3] 在这些国内变化的基础上，中国在 2014 年 9 月 19 日颁布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2014-2020）》并且首次单方面

[1] 由“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引起的一波又一波的政权更迭和 2008 年奥运会前的维权运动，使得中国对国外（尤其是美国）各类与人权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设置联络处和开展活动变得更加警惕。

[2] Elizabeth Economy, *The River Runs Black: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The Devil at the Doorstep”, pp. 177-220; Chan (2006), pp. 143-71; Fengshi Wu, “Old Brothers or New Partners: GONGOs in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Advocacy in China,” *China Environment Series*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5 (2002), pp. 45-58; Katherine Morton, *International Aid and China's Environment: Taming the Yellow Drag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5); David Scott, “Environmental Issues as a ‘Strategic’ Key in EU-China Relations”, *Asia Europe Journal* 7: 2 (2009), pp. 211-24; Fengshi Wu and Yuan Xu, “Sino-American Environmental Relations: The Potential of Trans-Societal Linkages,” *Issues and Studies* 49: 3 (2013), pp. 73-110.

[3] Joanna I. Lewis, *Green Innovation in China: China's Wind Power Industry and the Global Transition to a Low-Carbon Econom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Yuan Xu,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rategy for Rapid Pollution Mitigation in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47: 17 (Sep 2013), pp. 9596-603.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战略与管理 2: 智慧城市

战略与管理 2: 智慧城市

总 编 辑: 秦朝英

执 行 主 编: 郭琼虎

编辑部主任: 蒋湘陵

专题部主任: 连 乐

研究部主任: 林官宝

特 邀 编 辑: 陈壁生 梅剑华 杨秀娟 厉克奥博 阎小骏 曹勉之

责 任 编 辑: 晋壁东

封 面 设 计: 樊 俊

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jhpress.com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11 号国宏大厦 C 座 3 层

邮政编码: 100038 电话: (010) 63906433 (发行部)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787mm × 1092mm 1/16 19 印张 224 千字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82-0370-3

定价: 48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 63906404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出版部调换

对外宣布在 2020 年, 全国碳排放要比 2005 年减少 40% ~ 45%。

尽管有充足的证据显示中国积极参与各类国际环境公约建立并且建立国内履约的机制, 但中国有时也对世界亮出“红牌”, 并且回避制度建设。例如, 《保护与使用越境水道和国际湖泊联合国公约》(《联合国水公约》) 自 1997 年起就对各国开放签署, 并且赢得了来自联合国成员的广泛支持。中国与土耳其等少数几个国家决定不参与其中。^[1] 置身于这个国际机制之外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直接和显著的危害, 所以目前来说政府不会对“旁观者”的身份作出修正。

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 以及石油与其他能源最大进口国, 但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全球治理中处于边缘和劣势地位。^[2] 中国既不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也不是国际能源署(IEA)的成员, 而这两大机构分别代表了全球石油治理中最主要的卖方与买方。直到最近这两家政府间机构才吸收中国为合作伙伴国家。^[3] 世界上经济最强国家形成的政治联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 8 大工业国组织 G8 (2013 年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后变为了 G7)——代表石油购买方利益(除了俄罗斯的特殊情况), 对稳定全球能源市场和管理至关重要, 但中国都不属于这两大集团。^[4] 在有关核能和天然气的国际谈判和合作中, 中国实际上也没有正式参与其中。中国既不是天然气出口国论坛(不如 OPEC 那么正式的出口联盟)的成员, 也不是核能总署(OEDC 内部成立的特别机构)的一方。在能源领域唯一的例外是中国正式参与了联合国的国际能源论坛

[1] 作为“亚洲水塔”, 中国是 14 条跨国界河流的上游国。

[2] David Zweig and Jianhai Bi, “China’s Global Hunt for Energy,” *Foreign Affairs* 84: 5 (2005), pp. 24-38;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ael A. Levi, *By All Means Necessary: How China’s Resource Quest Is Changing the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 目前至少有四位中国员工在 IEA 巴黎总部工作, 为协调中国在国际油价谈判中的利益与参与程度服务。

[4] Dubash and Florini, 2011; Thijs Van de Graaf and Kirsten Westphal, “The G8 and G20 as Global Steering Committees for Energy,” *Global Policy* 2 (Sep. 2011), pp. 19-30.

(IEF)——一个协调世界能源市场上所有相关国家的宽泛性机制。^[1] 然而，中国在 IEF 的身份最近才从“对话伙伴国”变为“正式成员国”，这再一次显示了中国在该领域全球治理中处于初级参与阶段。

“中国会撼动全球治理的格局”这样的观点可能很吸引眼球，但是在急于认可这个观念之前，人们必须有一个清醒认识：在许多领域的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格局中，中国的参与并不完整，也没有成为核心成员。中国在不同领域的表现是非常不同的，相对而言，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大部分的环保领域的全球治理中是一个“履约者”，尽管程度有所不同；而在人权领域基本是一个“摇摆不定者”和“旁观者”；在能源领域几乎没有加入到任何权威组织；在安全领域，中国参与模式最为复杂，履约与隐性抗拒并存。

三、4 条路径改变现状

上一章节梳理了中国在全球治理的 5 大领域中不完全和不均衡的参与状态，本章意在概述中国在条件与机会允许的情况下，近年在不同的国际政府间组织中的表现。上文提及 4 大“国家—政府间组织”关系类型划分适用于所有的案例，但是下文提到的 4 种路径仅适用于中国的情况（表格 3）。

表格 3：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四种改变途径

	现状	转变
I	履约者	大幅提升：积极主动地参与；追求领导地位；建立新的全球机构
II	摇摆不定者	加强自我防御
III	旁观者	保持缺席
IV	被排除在外者	推进：积极谋求成员国资格；创造新的间接参与机会

[1] Bo Kong, “Governing China’s Energ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Policy* 2 (Sep 2011), pp. 51–65.

第一条路径是针对“履约者”的状态而言的,强调中国在某个领域全球治理体制中的地位会有显著提升,特征是支持机构或者程序性的改革和追求机构内领导地位。例如,在参与制定联合国关于全球发展议题和核心文件的过程中,^[1]中国尽管一贯支持联合国大多数的主张和倡导,但最近几年更多发声,通过更多渠道表明自己的立场,坚持将政治因素与扶贫和经济发展目标剥离开来。^[2]又如,2015年,中国反对大多数其他《南极公约》缔约国提出的倡议,导致在南极海域建立4个海洋保护区的计划被推迟。^[3]在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谈判中,2015年巴黎会议之前,中国已经从早期的列席状态到越来越多地以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姿态出席,并推动从而使得“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被广泛认可。^[4]更有甚者,在美国反对的压力下,中国还是成功争取到足够支持,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开始人民币加入全球储备货币篮子的审核程序。^[5]在全球林业治理领域,中国2000年以后被国际舆论指责在中南亚、非洲国家进行大量非法采伐和毁林行动,政府近几年积极改变这一公众形象,在国内加紧了对有海外业务的林业企业的监管,增加了双边、多边的可持续林业合作。现在中国是联合国森林论坛积极的成员之一,促成了《热带雨林公约》,并主动承担

[1] Harman and Williams (2014); Gu et al (2014).

[2] Thomas Fues and Ye Jiang, eds., *The United Nations Post-2015 Agenda for Glob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from China and Europe* (Bonn, Germany: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Entwicklungspolitik, 2014).

[3] 中国的反对主要基于在这些领域资源开采的考量。

[4] Phillip Stalley, “Principled Strategy: The Role of Equity Norms in China’s Climate Change Diplomacy,”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3 (2013), pp. 1-4.

[5] Andrew Mayeda and Fion Li, “Yuan Has Real Shot at IMF Blessing on Reserve Status,” *Bloomberg Business* (11 Dec.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4-12-11/yuan-has-real-shot-at-imf-blessing-on-reserve-status>, accessed 20 Mar 2015]; Lingling Wei, “China Rallies around Yuan as IMF Mulls Reserve Currency Inclusi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5 June 2015) [available: <http://www.wsj.com/articles/china-rallies-around-yuan-as-imf-mulls-reserve-currency-inclusion-1434366682>, accessed 15 Jun 2015].

主办大会等各种责任。^[1]

沿着这条路径，预计中国还会尝试更大胆的方式提升它在某个全球治理领域的地位，比如创立一个新的并列的多边机构，这样它可以作为创始国享有以前从未有过的特权和决定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正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因为中国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中增加投票权力的机会不大，促使这两个跟中国关系紧密的国际发展银行从内部进行制度改革需要很长时间，而中国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又有独到的经验，建立亚投行是有力的一招。另一个反映“大胆尝试”的案例是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峰会的私下会晤中达成了未来20年中美两国在减少碳排放方面的双边协议。^[2] 尽管仍然受到了两国国内的一些批评，并且与联合国主导的多边主义有悖，这项共同倡议还是被双方政府视为一个可行的选择，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行，有利解除当时中美两国都没有很好完成减排的僵局。不论美国或其他主要国家是否支持，中国考虑开创一些新的多边合作机制与论坛，不一定是竞争性的、排他性的，主要是争取更多的创始国地位，跳跃式地提升自己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但是，要反复强调的是，第一条途径只适用于“履约者”的情境，在中国已经高度融入现有的全球体系，并且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和惯例进行了成功国内改革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大胆建立新的多边机制和机构方面。

第二条转变路径，以“摇摆不定者”的身份为起点。在这一情境中，中国已经成为某一个政府间组织或国际协议的签约国，但仍然对规定的模式、原则和承诺有所犹疑。与路径一不同，沿着路径二，发生的转变多将

[1] P. O. Cerutti, S. Assembe-Mvondo, L. German and L. Putzel, “Is China Unique? Exploring the Behaviour of Chinese and European Firms in the Cameroonian Logging Sect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view* 13 (2011), pp. 23-34.

[2] 中国宣布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会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且做出最大努力让峰值提前到来，同时2030年将非化石燃料在初级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提高到20%。

是渐进式的, 并且不引人注目的。比如, 面对人权领域的政府间组织时常的压力, 中国不会选择激进的方式进行对抗, 而是会策略地加强防御。^[1]从 2006 到 2012 年, 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两个任期内, 中国政府只联合发起过一个非程序化的方案, 并且在定期大会中从不主动发起辩论或者批评其他政府。然而, 在 2014 年, 暂别委员会 1 年后, 中国政府已经参与联合发起了两个非程序性提案。2014 年 6 月 26 日, 由中国和其他 12 个委员会国家联合发起了“保护家庭”提案, 尽管投票结果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 美欧等发达国家投反对票并且场外有大量媒体批评, 但是提案最后还是获得了通过。这一结果在联合国外引起了激烈的辩论。^[2]该事件表明, 中国正在“国际人权领域尝试一种更为独断的外交风格”, 会运用合作机制内的很多条件来防御对自身的攻击, 甚至提前出击来改善自己所面临的多边环境。^[3]

第三条路径从“旁观者”的位置出发, 预测不会有太多明显改变。如果中国以前能够承担不接受某种国际准则或公约所付出的代价和压力, 那么未来几年它更有能力这样做下去。《联合国水公约》于 2014 年 8 月 17 日生效, 没有迹象显示中国会考虑签约。此外, 中国坚定的反对态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南亚国家批准实施该公约。“因为中国反对《联合国水公约》, 印度认为批准它是不明智的。”^[4]事实上, 在中国固执的反对下,

[1] 这一观点主要基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官方网站公布的 28 期定期会议的报告。[<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Pages/Sessions.aspx>, accessed 20 Mar 2015].

[2] 这一决议投票结果为 26 票赞成, 14 票反对, 6 票弃权, 因而获得通过。[<http://www.universal-right.org/human-rights/human-rights-resolutions-portal/>, accessed 20 Mar 2015]. 因为这项决议采取了单一的家庭定义, 各式人权组织如欧洲议会的同性恋权利组织立刻表达了忧虑和批评。[<http://www.lgbt-ep.eu/press-releases/un-human-rights-council-adopts-non-inclusive-protection-of-the-family-resolution/>, accessed 20 Mar 2015].

[3] Sceats (2012) Summary Points 9.

[4] Zofeen Ebrahim, Joydeep Gupta, Liu Qin and Ramesh Bhushal, “China, South Asia Ignore UN Watercourses Convention,” TheThirdPole.net (18 Aug.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thethirdpole.net/china-south-asia-ignore-un-watercourses-convention/>, accessed 20 May 2015].

一些国际组织可能会迎合中国的某些要求，并且主动改善与中国的互动关系。^[1] 第三条路径貌似平静的表面下反映的实质是，中国坚定对抗某些政府间组织，并且抗压能力在增强。

第四条路径是针对中国在某些特定领域的国际管理机构中仍然被排除在外的情况而言的，强调中国沿着这条路径会做出巨大努力，调动资源，“挤入”现存的多边机构，争取到直接参与管制的机会。虽然这样的案例并不多，或者说中国被正式排除在全球级别的治理机构之外的情况不再是主流，但是其中一些案例还是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譬如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案例。中国通过各种渠道游说，释放了清晰的要求，希望 OECD 和 IEA 能够改革成员国申请条件，从而让中国有望参与石油市场的国际治理。^[2] 在可预见的未来，当中国没有可能取得某个多边组织的成员国资格时，它会通过投入资源来改善停留在多边机构之外的处境，增加外部的选择。比如，在 2013 年 11 月 IEA 的部长级会议上，中国表示了希望与 IEA 展开更密切合作的兴趣，希望通过建立非正式的机制可以让中国以一年两次的频率与 IEA 其他成员直接交流，观察高级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并且通过“内部圈子”与秘书处直接交流当前的国际能源问题。^[3] 虽然中国—MTCR 对话已经停滞，但是中国仍然保持着与 MTCR 成员国和其他武器出口机构的双边交流，以保证信息通畅和将来再次提出申请的可能。^[4]

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在采取“挤入”策略时，不会脱离现有的主导多

[1] 涉及紧急救助、人道主义援助和社会慈善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需要做出意识形态上的让步，获得中国政府的同意，达到最大程度救援生命的目的。(Fengshi Wu, "Strategic State Engagement in Transnational Activism: Aids Preven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 71 (2011), pp. 621-37).

[2] Joint report conducted by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and the Grantham Institute,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Reform and China's Participation", *Consultation Report* (Nov 2014) [<https://workspace.imperial.ac.uk/climatechange/Public/pdfs/Global%20Energy%20Governance%20Reform%20and%20China's%20Participation.pdf>, accessed 20 October 2015].

[3] Ibid, pp. 24-25.

[4] Saferworld (2015), pp. 1-2.

边合作框架去“另起炉灶”，不仅仅因为要建造一个新的多边机构并且吸引足够的成员参与是一件花费甚巨的事情，而且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中国由于被排除在外，缺乏参与某领域国际治理的经验，不可能给世界准备好一个既有新意又有可行性的计划。这是为什么沿着第四条路径尚未发现可以与成立亚投行相匹敌的案例的原因。另外，在“挤入”的过程中，中国急切地希望改变自己在某些全球治理领域中的非成员状态，可能会与美国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发生激烈的谈判和周旋。目前的舆论和研究比较多都集中在第一条路径，特别是国际经济领域中国的很多新的倡导（如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对第四条路径的注意不多，但是本文认为，“挤入”路径可能也会产生很多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摩擦。允许中国进入一些国际管制机制对于现有大国的利益影响并不一定比允许中国倡导一些并列的、辅助性的多边机构来得小，而中国“另起炉灶”所承担的风险要比“挤入”现行国际管制机制然后“搭便车”大得多。

以上4条路径是从5大领域的相关案例中总结出来的，不过它们也可以被应用于其他领域。有关于北极的治理案例显示了中国正积极“挤入”全球各区域事务，类似于路径四的情况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围绕北极的多边政治协商、对话和合作日益发展，^[1]，尽管并不是一个与北极接壤的国家，中国也了解到北极开发利用的战略意义，开始参与其中。^[2]

[1] Oran. R. Young, “Arctic Governance - Pathways to the Future,” *Arctic Review on Law and Politics*, 1: 2 (2010), pp. 164-185; “Arctic Tipping Points: Governance in Turbulent Times,” *Ambio* 41: 1 (Feb 2012), pp. 75-84; and, “Arctic Stewardship: Maintaining Regional Resilience in an Era of Global Change,”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26: 4 (2012), pp. 407-20.

[2] Matthew Willis and Duncan Depledge, “How We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bout China’s Arctic Ambitions,” *The Arctic Institute* (Sep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thearcticinstitute.org/2014/09/092214-China-arctic-ambitions-arctic-council.html>, accessed 1 Nov 2014]; Marc Lanteigne, “China’s Emerging Arctic Strategies: Economics and Institution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entre for Arctic Policy Studies, University of Iceland (2014)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nupi.no/Publications/Books-and-reports/2014/China-s-Emerging-Arctic-Strategies-Economics-and-Institutions>, accessed 1 Nov 2014].

中国成功应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全球生态共存（ecological interdependence）的理念和全球关注气候变化的大环境，将自身与北极治理联系起来，并且于 2013 年成功取得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的席位。^[1]虽然短期内无法成为该理事会的成员国，中国将北极事务置于与所有北欧国家的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事务之一，从而希望对北极事务施加间接影响。^[2]类似于北极，中国在传统上从未作为主要角色参与的世界其他区域，比如拉美、非洲、东欧和中东，出于不同的目的，都开始积极地“挤入”区域政府间组织，这一趋势正是路径四所展示的。

四、结论

Ross Garnaut 教授在 2014 年的文章指出：“直到最近，中国领导人才将一个日益重要的现实吸取到政策制定的考量过程中，那就是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举动是（全球）减缓气候变化取得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3]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的中国领导人心态的变化已经影响到了气候变化以外

[1] Zhong Shen (Op-Ed), “Jiji Canyu Bei Ji Shi Wu (Participate in Arctic Affairs with Vigor),” *People’s Daily* (22 Mar 2013) [available at: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0322/c1003-20876219.html>, accessed 1 Nov 2014]; Arthur Guschin, “Understanding China’s Arctic Policies,” *The Diplomat* (14 Nov. 2013) [available at: <http://thediplomat.com/2013/11/understanding-chinas-arctic-policies/>, accessed 1 Nov. 2014].

[2] Camilla T.N.Sørensen, “Changing Geopolitical Realities in the Arctic Region: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Relations between Denmark and China,” *Bulletin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he Polar Regions*, 2 (2014), pp. 2-7; Mikael Holter, “Norway Embraces Chinese Cash in Race for Arctic Oil Riches,” *Bloomberg Business News* (12 Nov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4-11-12/norway-embraces-chinese-cash-in-race-for-arctic-energy-riches.html>, accessed 20 May 2014]; Andreas Kuersten, “Russian Sanctions, China, and the Arctic,” *The Diplomat* (3 Jan 2015) [available at: <http://thediplomat.com/2015/01/russian-sanctions-china-and-the-arctic/>, accessed 20 May 2015]; Arthur Guschin, “China, Iceland and the Arctic,” *The Diplomat* (20 May 2015) [available at: <http://thediplomat.com/2015/05/china-iceland-and-the-arctic/>, accessed 20 May 2015].

[3] Ross Garnaut, “China’s Role in Global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China & World Economy* 22 (2014), pp. 2-18. Garnaut 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气候变化专家和前澳大利亚高级官员，近年成为中国科学院的荣誉教授，并在中国实地开展研究。

全球事务的各个领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层已经决定更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而不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经济、碳排放或者能源消耗的巨大规模被动地参与其中。

毫无疑问，中国会利用政府间组织和全球机构提供的所有场合，来挖掘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机会。更深入的问题是，中国如何与不同的政府间组织打交道，如何应对不同的事务和不同的管理原则。正如本文所讲，中国在全球机构中参与情况的变化取决于它在这些机构中过去和现在的位置和历史。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在与全球机构的互动中，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和发展国家利益的目标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在不同领域达成这两个目标的路径是不同的。

本文最重要的发现是，只有在中国已经加入主要国际多边治理机构，根据国际基本原则和标准在国内进行了实质性改革的领域，它才会实施大胆的步骤去争取核心和领导的地位，甚至建立新的国际机构，这方面最明显的是在经济发展领域的案例。否则的话，中国政府会增强自我防御，或者在现有全球机构内而不是机构外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即使中国对某些全球机构的态度是叛逆的，有时甚至是敌对的，但是在管理国际事务并没有取得足够的经验之前，是无法在国际管制体制之外来“另起炉灶”的。^[1] 相比“大幅提升”，中国政府接下来对“挤入”国际治理机构的投入很可能更多，而且也可能面临更多碰壁的情况，进而与现存的国际大国、多边机构的核心成员产生更多的摩擦。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而言，追求从一个普通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全球治理的领导者，将会是一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

(吴逢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全文由连乐翻译)

[1] 庞中英，“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人民论坛网（2015-09-16），http://theory.gmw.cn/2015-09/16/content_17059158.htm。

目 录

智慧城市

- 1 智慧城市理念再思考
——胡小明
- 15 智慧韧性城市：国外的经验与借鉴
——务玉姣 马 奔
- 37 生态城市的“智慧化”
——生态城市建设中大数据技术应用的理论探索
——连 乐

经济战略

- 53 通缩与汇率稳定
——余永定
- 92 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若干战略问题研究
——唐 元

政制之道

- 116 解读中国选拔制
——姚 洋
- 148 崛起中国家的心态安全问题研究
——王志军

目 录

国际关系

180 中国与全球治理：跨越门槛的四种路径

——吴逢时

201 朝鲜战争与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和转换

——林晓光

法治论衡

229 迈向信息社会主义：中国知识产权法的理论反思与战略勾画

——鲁 楠

社会视野

243 大学“讲理”机制缺失的现实原因

——王长乐

257 社会治理模式演化的阻力与突破路径

——杨 浩 单许昌